重建僊花寺紀念利瑪竇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

雷　強*

在廣東肇慶建一座紀念館，紀念利瑪竇在歷史上開拓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貢獻，已經在多個歷史、文化研討會上提出過，已不是甚麼新鮮事兒。但因為別的甚麼原因，社會上一直未見有實質性的回應。我認為在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穩步上昇、綜合國力顯著上揚、我國社會政通人和百業俱興的大好局面下，排除一些障礙在肇慶建館紀念利瑪竇，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精神，應該是時候了。

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受該會派遣於1583年從澳門來肇慶傳教。在肇慶六年，他以為我國人民崇尚佛教，自已削髮剃鬚披袈沙，自稱“西僧”，以便接近群眾，易於傳教。他利用從西方帶來的各種器物如自鳴鐘、地球儀、世界地圖、三稜鏡、望遠鏡、日晷和各種精裝西文圖書等於臨時住處展示，並且向群眾講解，宣揚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他着重依靠對他有好感的各級地方官員的保護和支持，得以在肇慶居留下來。他主持建造了中國第一所教堂——僊花寺。在肇慶，他得到知府王泮的幫助，覓地建教堂兼居所，還給教堂題名為“僊花寺”。王泮還送來親手書寫打造的匾牌掛在教堂門上，並喻知居民不得干擾。在肇慶及以後在韶州、南昌、南京以至北京，利瑪竇著書立說，介紹及應用西方一系列科學技術知識，撰寫教理。利瑪竇以科學傳教打開中國人的視野、增進新的知識技術，造福中國社會，也使他聲名昭著，有助於他的傳教活動，進而得到朝野贊譽及皇帝的重用。

在利瑪竇從西方帶來的各種器物中，雖都不是當時西方最新、最尖端的科技成就，但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效實用之物,確實使大眾開了眼界，並且對多個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的還是奠定了基礎的作用。

世界地圖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利瑪竇在教堂中廳懸掛他帶來的〈萬國輿圖〉(西文世界地圖)，是最早傳入我國的世界地圖。它引起了人們特別是士大夫們的極大興趣。它與當時中國的世界地圖《天下總圖》(當時的“廣輿圖”、“輿圖志”統稱為“天下總圖”)大不相同。中國過去因為地大，自稱“中央之國”，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周圍畫一些已知小國和一些海島，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省大。所謂的“世界”僅限於中國的十五個省，既沒有經緯線，也沒有地帶劃分。國人對比西文地圖，聽了利氏對西圖的介紹分析，才知道世界之大，國家之多，中國祇佔世界東方部分的一個小角，使人們第一次看到整個地球的面貌，知道地球表面有五大洲、子午線、經緯度和五大地帶的劃分。中國人在這個時候才開始睜開眼睛看地球。王泮十分贊賞這張西文世界地圖，要求利瑪竇將該圖譯製，將中國放在圖的中央，並加上中文說明。利氏高興地照辦了。他作了一些技術處理：“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的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

*雷強，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出現在中央。”(1) 該圖於 1584 年 10 月完成，名叫“山海輿地全圖”。王泮叫人刻印，作為禮品分送其省內外的要人和朋友。利瑪竇後來於 1595 年修改之，在蘇州、南京、北京等地多次重版，祇在南京便翻刻印製了十二次之多，廣為流傳。(2)利氏入北京後為配合神宗心意，測量了南京、杭州、北京、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別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將中國畫在中央，並按地球經緯度製作，將世界五大洲和五帶的地理科學知識詳加介紹給中國，此即為中國近代世界地圖之始。(3)

1602 年耶穌會士湯若望繼利氏帶來的望遠鏡和自鳴鐘之後，又帶來新式望遠鏡，並於 1626 年用中文著《遠鏡說》一書，詳細介紹望遠鏡的原理、性能和製作工藝，此為近代光學傳入中國之始。自鳴鐘自肇慶傳入中國之後，近代機械技術傳入廣州，廣州工匠即按利氏原理仿造自鳴鐘。 1627 年由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王徵筆錄著《遠西奇器圖說錄》，在北京出版發行。此為我國介紹近代物理學知識的第一本著作。(4)

利氏運用上述帶來的世界地圖、望遠鏡、三稜鏡、日晷等器物的使用，向人們介紹了天文科學知識，是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後又於1605年翻譯出版了天文學專著《乾坤體義》。此書上卷、中卷談及日月地三者關係及“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以及“日球大於地球，地球大於月球”之科學知識。利氏還著《經天略》一書，將西方已測定的諸恆星編成歌曲，便於中國民眾背誦掌握。繼利氏之後，李之藻著《渾蓋通憲圖說》一書，具體介紹了“地圓”、“地動”理論，使中國首次衝破傳統的“天圓地方說”。(5)

《乾坤體義》下卷皆言算術，是西方近代數學傳入中國之始。 1607 年，由利氏口授，徐光啟筆譯歐幾里得著的《幾何原理》一書（凡六卷），向中國介紹了西方近代數學的最基本內容知識。(6)1607年利氏和徐光啟合譯《測量法義》一書，介紹了勾股、測量知識。 1608 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錄《同文算指》一書，闡述比例、級數、開方等知識。其後利氏和徐光啟合著《測量異同》、《勾股義》兩書，詳釋三角學的知識。(7)

羅明堅與利瑪竇兩神父在肇慶期間，為了攻下漢語難關，他們重金請來福建秀才當老師。利有學習外語的天份，記憶力很強，多年刻苦學習，已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他是西方第一個精通漢語的傳教士，不但能操流利的中國語，還能用漢文譯著。他在華二十七年中，漢文著譯共有十九種。利氏在攻讀漢語過程中，與羅明堅合編一本《葡華字典》，名叫《平常問答詞義》，它是我國第一部中西文字典，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為中文拼音開闢一條新途徑。在肇慶，利氏編纂第一部中文天主教教義著作《天主實錄》，對當時傳教起了很大作用。(8)

明代中葉開始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大規模傳入，主要是由入華耶穌會士在傳教之時同時帶來的。它是一種主觀上傳教而客觀上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文化的過程。這就是通過耶穌會會士為媒介的歷史上稱為“西學東漸”的過程。而其中最顯著的代表莫若利氏。

不僅如此，利氏在傳教中刻苦鑽研中國典籍。他在韶州受其學生瞿太素啟發影響，感覺到在華傳教首先要得士大夫認同，於是破佛揚儒，脫卻僧裝，留鬚束髮，改穿儒服，緩談“歸化”（基督），多講實學。這是利氏在華活動的一次重大策略轉變。

其實利氏確是悉心鑽研儒家學說。祇要看他用外文著釋儒家學說即可見一斑。 1593 年，利氏在韶州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譯為拉丁文並“加寫短短的註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寄回意大利出版。這是四書第一次全部譯為外文之始。 1620 年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把《詩》、《書》、《易》、《禮記》、《春秋》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

利瑪竇對孔子的學說有深刻的理解。對於中國人的禮貌孝道，他作了概括和形象的描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現，那麼下述的情況一定可以見證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可以和中國人相比。孩子們在長輩面前必須側坐，椅子要靠後；學生在老師面前也如此。孩子們總是被教導說話要恭敬。即使非常窮的人也要努力工作來供養父母直到送終。”“中國人比我們更尊敬老師，一個人受教，那怕祇有一天，他也會終生都稱老師的。”(9)如

果不是結合在中國社會長期生活的實際，一個外國人對孔子之道有如此深刻的體會是不可能的。利氏在晚年用意大利文撰寫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又稱《中國劄記》），與之合撰者之一同會比利時人尼古拉・金尼閣，將之從意大利文譯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之後，各種譯本紛紛出現，計有拉丁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原書的英文本於1942年出版，書名為“十六世紀的中國 —— 利瑪竇劄記，1583-1610”，中譯本在近年面世，書名為“利瑪竇中國劄記”，即現在發行的1983年版本。該書全面忠實地概述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政制、經濟、思想、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及其本人的傳教活動，是一個親身經歷的真實記錄，與那些道聽途說或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一些資料和知識實不可同日而語，而據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當然也與之迥異。明中葉隨着大批傳教士入華傳教，耶穌會士陸續來華開展教務，西方探究中國各個方面特別是儒家學說的研究日益增多，形成“中學西傳”的過程，“漢學”從此興起。利瑪竇所研究的中國是真實的中國、活生生的中國，可以說是高品質、高水準的漢學之始，所以有人稱“利瑪竇是漢學的開山鼻祖”。(10)

中西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既有“西學東漸”，也有中學西傳的過程，這兩者突出地結合在利瑪竇身上。在歷史上，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臺灣的方豪神父高度評價利瑪竇對於中西文化交流所建立的功績：“利瑪竇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華，迄於乾嘉厲行禁教之時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西洋近代文學、曆學、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傳入。”(11)

據史籍記載，基督教傳入中國，在明末清初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們入華之前有過兩次。第一次是唐代基督教聶思脫里派的傳入，被稱為景派。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曾被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考訂過，但沒有留下多少痕跡。第二次是元朝，其統治橫跨歐亞，基督教再度傳入。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就提到中國有基督教堂。利瑪竇也有記載說中國在五百年之間一直有基督教的信徒(12)，但沒有甚麼突出的表現。現在所講的基督教傳入，是指明清之際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第三次傳入的基督教。如方豪先生所言“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利瑪竇神父是這個時期的傑出代表。所以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利瑪竇在歷史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實不為過。

重建僊花寺　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精神

建館紀念利瑪竇，弘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優良傳統，在肇慶選有意義而又較現實的一個方案是恢復僊花寺“原貌”。這樣會令人想起利瑪竇在肇慶開始他的中西文化交流事業，儘管他主觀上是為了傳教而來的，客觀上卻是開啟了嶄新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業。這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利瑪竇之後，中西文化交流已成為不息的洪流，利瑪竇開啟的事業是偉大的。

但在具體重建僊花寺時會碰到一些技術問題。關於僊花寺形狀及其規模，利氏在《劄記》第四、五章中祇講了一點，不詳細不具體，希望今後在其它資料上去發掘。關於利氏的資料搜集及研究，廣東的學者一直在努力進行。前幾年有羅方光在《肇慶文史》第二輯上（1985年10月）發表的〈利瑪竇在肇慶〉一文，今年（2003）有司徒尚紀的《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一書（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黃啟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5月），劉偉鏗的〈內陸海洋兩大文明的演進與嶺南漢族三民系形成的歷史探源〉一文，陳實〈明清時期基督教文化傳播的先驅 —— 王泮〉（《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5月）一文，都在探索利瑪竇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這裡不得不談到被利氏譽為他的保護神和依賴人的肇慶知府王泮。在肇慶的日子裡，如果沒有官府的支持，利瑪竇就無法立足，更不用說傳教了。甚至可以說，當年如果沒有王泮很可能就沒有利瑪竇。現在要備齊王泮這個為官清廉有德政的地方官員的資料是不容易的。然而要建館，肇慶市歷史名城研究會的同仁完全可以擔當起這個重任。不少海內外和境內外的

朋友多次表示可以從圖書資料、經費上給以協助和支持。1998年利氏的故鄉意大利安柯那省的馬塞拉塔市給肇慶市寄來一尊利氏銅像，卻被置於海關倉庫裡，好幾個月都沒去領；後來由天主堂的李神父將銅像領回，供在教堂側面的大廳供人瞻仰。神父雖然沒有發出甚麼通知，但仍不時有些外國朋友前來教堂參觀瞻仰。北京市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而建造“中華世紀壇”，其中心世紀廳以環形浮雕群像來展示中華文明幾千年發展史，浮雕中姓名可考的人物不過六七十個，其中就有兩個外國人，而且都是意大利人 —— 一個是馬可波羅，另一個就是利瑪竇。(13) 在我們看來，利瑪竇開啟的事業首先不是傳教而是擔當文化大使，利瑪竇是世界文化名人。肇慶市政協副主席劉偉鏗先生說得好：“利瑪竇是一個世界品牌！”我認為利氏首先是一個文化品牌，然後才是一個旅遊品牌。對於肇慶來說，說得上旅遊的世界品牌就不多，我們無理由將之長期擱置起來。如果紀念館一時未及興建，我們建議可以在現在的肇慶博物館內設一個室來作紀念，亦可當作建館的準備。

今天我們紀念利瑪竇是為了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學習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進科學的部分，是我們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從而增強實行對外開放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友好相處、平等交往的各國文化使者的肯定與友情，也顯示了中國政府實行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項開明政策。(14)

歷史在前進　認識在提高

這次研討會，我之所以將一篇2003年寫就而未能以原題公開發表的文章提到大會上交流是有原因的。2003年在澳門召開了一個珠江流域西部與澳門旅遊資源開發問題的研討會。許多澳門、外國尤其是葡國和意大利的朋友到肇慶旅遊，都帶着懷念之情想去看看利瑪竇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他們找了很久，結果祇看到一小段陳舊的斷牆裂壁，多少有點失望。在他們心中利瑪竇是個偉人，是他們的驕傲。這使我萌發一種想法：肇慶得趕緊造一些像樣的東西來紀念這位偉人，才對得起我們的國際友人，應該感謝利瑪竇對開拓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我於是便寫了這樣一篇短文；但遺憾的是，會上沒有對此作任何反應，祇好作罷。其時亦有人勸我說，國際政治鬥爭很複雜，利氏之名字很敏感，不能隨便出現，勸我不要再搞了。我甚不以為然，認為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不是歷史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觀點。我當時還未知道2001年10月在北京已召開過一次“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2003年將提交大會的三十六篇論文和發言選出二十六篇出文集中文版（另有英文版），文集的名稱為“相遇與對話”，內容議題相當廣泛，圍繞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歷史交流的有關問題，包括歷史、文學、語言、藝術、科學、宗教、神學、外交關係、經濟交往、古籍版本比較等方面；但細看之下，發現在文章標題上沒有一篇提到利瑪竇，對比於利氏在這段期間的貢獻，就有欠公平了。會議討論形成一種富有哲理性的認識，值得我們很好地體會和思考一下吧 ——

> 實際上中西文化的相遇與對話，正是其文化主體人的相遇與對話。(……)我們在中西文化的溝通和對話上，不僅要尋找其同一性和互補性，也必須清楚認識其個殊性和差異性，既應有求同存異的努力，亦需要和而不同的冷靜。我們應以歷史學家的執着和姿態，在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理中，獲得解決歷史疑難的思路和睿智，從而使我們的歷史學有新的收穫，並可能促進我們的歷史有新的突破。(卓新平：《相遇與未話》前言)。

這次在廣東肇慶舉辦的“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2006年12月9-10月），也是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相遇與對話”。來自北京、廣州、山東、湖北、海南、澳門等地以及意大利的專家學者連同肇慶本地的專家學者五十多人參加了這個研討會。他們以“肇慶在利瑪竇文化傳播中的歷史地位和影響”為主題，展開了為期兩天的熱烈討論，還就肇慶如何挖掘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文化的積澱提出一些具體建議。會議收到四十多篇論文，有

趣的是這些論文絕大多數的標題都寫上利瑪竇的名字了。就連這次研討會的名稱也耀眼地突出了利瑪竇的名字，這是實至名歸的。既然已有數以百計的論文都在論證而且還會繼續論證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貢獻，為何要隱去他的大名呢？或許有人說，利瑪竇在華這段時間對整段明史或明未清初來說，祇是一小段時間，當時的社會主流文化也不是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們所從事的“東學西來”，何況傳教士來華的目的主要是傳教，要改變國人的信仰，而不是開拓中西文化交流活動等。這些“論點”，在余三樂提供給大會的書面文章〈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中已辯駁清楚了。司徒尚紀的〈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劃時代貢獻〉、黃啟臣〈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和南雄〉、曾崢〈對“中國現代數學起源於肇慶”命題的若干思考〉、徐新〈利瑪竇和傳教士向中國傳播油畫〉、劉偉鏗〈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法蘭西斯科．馬格里奧庫勒的〈利瑪竇和他的中國情懷〉、韋相伍〈肇慶 —— 利瑪竇成名之地〉、陳增岳〈試論利瑪竇“耶儒會通”的傳教方略〉和其它未及全讀的論文等，已從各個方面頌揚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績。對於有些商榷文章，如謝貴安〈利瑪竇“送禮”初探〉、龔重謨〈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不是利瑪竇 —— 也談湯顯祖與利瑪竇〉和一些不同看法，也展開了認真和熱烈的討論。研討會自始至終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祇可惜研討會會期太短，而活動項目多，用於研討的時間不足，有的同行我還來不及進一步認識便分手了。

對於我個人來說，深感有幾點認識上的提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碰撞、“相遇與對話”）中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的是其人其事對我國傳統文化主流產生甚麼影響，祇要它的效果對傳統文化主流產生促進作用便應該肯定；而不是僅看或主要看其背景動機，那是次要問題。

二、這次以“利瑪竇在肇慶活動”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對挖掘、整理肇慶地方特色歷史文化資源、加強中西文化學術交流是成功的。肇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肇慶學院在相對短促的時間內，克服了種種障礙和困難使會議得以如期順利舉行，其艱巨之處非籌備人員是無法感受到的。會上提供的論文有很大部分是肇慶學者所寫，特別是肇慶市的年輕學者所寫。青年人從事考古文獻工作及其感觸是獨特的也是不容易的，值得慶幸。這也旁證了我在〈重建僊花寺，紀念瑪利竇〉一文中所述及的靠肇慶的力量完全可以建設起“僊花寺”來的看法。參加會議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建築師法蘭西斯科．馬格里奧庫勒說，他設計了一個“僊花寺”藍圖，我們希望他能拿出來甚至做成模型供大家參考和進一步討論。這次研討會引起了意大利政府駐華機構和那不勒斯大學的關注，利瑪竇故鄉馬切拉塔市政府通過廣州領事館轉達了組團來肇慶訪問並與肇慶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願望。

三、會議還特別組織一個“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瑪竇”陳列（歷史文獻、圖片、繪畫以及場景等形式），收到不錯的效果，不妨添加一些實物，成立一個以利瑪竇在肇慶為主體的展覽館供遊人參觀。其中《利瑪竇在肇慶》可廣印成書，而“陳列簡介”右上方的利瑪竇圖像則可印成明信片發行。

四、建議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由肇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肇慶學院為主要發起人，成立“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究會”。現在是時候了，應着手進行。

【原文寫於 2003 年，因故未能按原題公開發表；今為參加肇慶第一屆利瑪竇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2 月），按原題發表。】

【註】

（1）（9）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中華書局 1983 年 3 月出版，頁 179-180；頁 11-12。

（2）羅方光：〈利瑪竇在肇慶〉，《肇慶文史》第二輯，頁20。

（3）（4）（5）（6）（7）黃啟臣主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 2003 年 5 月出版，頁 467；464；462；461；463。

（8）羅方光：〈利瑪竇在肇慶〉，《肇慶文史》第二輯，頁13-16。

（10）羅方光：〈利瑪竇在肇慶〉，《肇慶文史》第二輯，頁15。

（11）方豪：《中國交通史》下卷，頁 692，嶽麓書社 1989 年版

（12）汾屠立：《利瑪竇歷史著作集》卷一，頁344，352，469，參見《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譯者序言頁 24 。

（13）（14）余三樂：〈利瑪竇墓地歷史變遷〉，《當代北京史研究》2003 年 3 月，頁 35。